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 编
广西民族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
执行主编/杨通进 唐贤秋

APPLIED ETHICS

中国 应用伦理学

国际伦理专辑

2011-2013



013068386

B82-53
15
2011-2013

北航
社



2011-2013



中国应用伦理学

国际伦理专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 编
广西民族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
执行主编/杨通进 唐贤秋

B82-53
15
2011-2013



北航 C167609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应用伦理学：2011—2013：国际伦理专辑 / 杨通进，唐贤秋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广西民族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编。—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8

ISBN 978-7-5155-0818-4

I. ①中… II. ①杨… ②唐… ③中… ④广… III. ①伦理学—文集 IV. ①B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3761号

中国应用伦理学：2011—2013：国际伦理专辑

作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 广西民族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
执行主编	杨通进 唐贤秋
责任编辑	柴 桦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5
字 数	376千字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818-4
定 价	3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100013
发行部	(010)84254364		
编辑部	(010)64222699		
总编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前 言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全球化进程日益加深、日益加快的时代。在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与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将越来越深地受到各国的内政外交政策、特别是国际制度的影响。在人类正在逐渐朝着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发展的今天，各民族国家之间应当如何相互交往，如何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建构一种更加合理的国际制度，使各民族能够更加公平地分享全球合作的利益，更加公平地分担国际义务，将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也是当代国际政治需要优先加以处理的根本问题。我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也是负责任的大国。我国的外交政策要想占领国际舞台的道义制高点，就必须研究和了解国际伦理的相关话语，了解国际社会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及其证明方式。因此，研究国际伦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际政治问题与伦理、价值等规范问题密不可分。每个国家的外交决策都部分地依赖于该国所秉持的价值承诺和伦理规范；国际共同体所遵循的许多规则和程序同样也是以具有道德色彩的价值和规范为基础的；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都以实现某些伦理理想为使命。因此，“道德价值是国际关系的本质要素；对国际政治来说，国际伦理是至关重要的”。^[1]“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世界政治实质上是一项规

范谋划。”^[2]对政治伦理和伦理政治的思考一直是国际政治生活的一个根本特征。因此，要探讨并解决国际政治问题，就必须探讨和解决国际伦理问题。

一般认为，国际伦理（international ethics）一词具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的国际伦理指的是国家之间的伦理或国际关系伦理。大多数国际政治学者都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该术语的。广义上的国际伦理与全球伦理（global ethics）或普遍伦理（universal ethics）的含义相近。持有世界主义取向的国际伦理学者往往倾向于从广义上来理解国际伦理。在这些学者看来，完整的国际伦理不仅包含国家之间的伦理，还包括全球人际伦理和全球制度伦理，这两种伦理的主体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此外，一些学者也使用伦理与国际关系（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伦理与国际事务（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等术语来指称国际伦理。^[3]

20世纪中期的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都极力回避规范方法，因为以卡尔为代表的占据当时理论主流的现实主义者指责说，那种方法是幼稚的理想主义或乌托邦。国际伦理在20世纪晚期的复兴与下属两个现象密不可分：

第一，冷战期间超级大国之间紧张而激烈的对持、超级大国主宰的许多代理人战争、超级大国之间“确保相互毁灭”的持续威胁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南亚发生的灾难性的战争，促使人们重新关注由奥古斯汀和阿奎那开创的正义战争传统、以及他们试图为战争行为确立合法依据的努力。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对战争伦理以及伦理与国际关系的兴趣为后来40年国际伦理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第二，20世纪后期，国际政治景观氛围的改变以及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也为人们把“新的规范方法”应用于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去殖民化的过程导致了殖民地向主权

独立国家的转型；联合国不仅制定和颁布了许多涉及人权及制止种族灭绝的各种规约，还把它们加以制度化；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扩散导致了“高科技”战争的出现；民族国家之间在经济上日益相互依赖；全球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跨越国家边界的社会运动、利益集团和 NGO 日益增多；因水灾、旱灾、军事冲突和强制移民而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使得人们呼吁对遥远地方的危机实施军事干预；民族国家内部和民族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过程在全球蔓延；诸如气候变化、水和空气污染、食品与资源稀缺等全球环境问题在进一步发酵。伴随着这些问题的出现，探讨国际和全球事务的规范方法不但变得越来越流行，而且变得越来越重要。

尽管关于国际关系的规范理论在 20 世纪上半叶相对受到忽视，但是，20 世纪后半叶以来，这一局面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或许可以把《伦理学与国际事务》这一学术季刊在 1987 年的创刊视为“国际伦理”这一新兴学科正式诞生的标志性事件。

二

国际伦理探讨的是那些跨越国界的伦理与责任问题。它首先要审视这样一种假设，即我们负有的帮助他人和避免伤害他人的道德责任并不会基于下述原因而削弱：这些人生活在离我们较远的地方，或居住在不同的国家，或与我们没有任何个人关系纽带。某些国际伦理学者认为，我们应当接受这一假设。因此，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不是我们是否属于某个共同体，而是我们所拥有的伤害他人或给予他人以帮助的能力。然而，也有一些国际伦理学者认为，这一假设是错误的。在他们看来，我们对自己的邻居或同胞负有的义务责任优先于我们对一般意义上的人类责任；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我们对作为整体的人类几乎不负有道德义务。因

此，国际伦理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对国界之外的其他人是否负有道德义务，以及负有何种道德义务。

与应用伦理学的其他学科不同，国际伦理具有这样一些显著的特征。首先，它的研究范围非常宽广。它关注的不是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内部的伦理问题，而是跨越国界的伦理问题；它探讨的不是人们对自己的同胞负有何种义务的问题，而是人们对其他国家的人、甚至全人类所负有的道德义务问题。

其次，国际伦理非常复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的大多数道德问题都是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问题。例如，在等候公共汽车时，我们可以决定自己是否遵循排队等候的原则。但是，如果一个被战争吞噬的国家的难民的命运令我们感到不安，那么，我们究竟有多大的能力帮助他们，或者采取何种帮助方式来帮助他们，这些都不是一目了然的。当然，我们可能会认为，把钱捐给国际红十字会等国际组织，由它们来帮助那些难民，可能是最好的帮助方式。但是，许多国际伦理问题是如此的复杂和繁重，以致它们只能靠政府来加以解决。在发生野蛮内战的国家，战争双方的贫民都成为杀戮的对象；对于遭受战争苦难的这些贫民，任何个人或私人组织都很少能够提供帮助。只有政府或联合国这类国际组织才能解决这类悲剧。某些伦理学家据此认为，作为个人，我们不负有减轻无辜贫民之痛苦的义务。但是，其他伦理学家则认为，我们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因为，作为个人，我们可以采取某些行动来实现这一目标，例如，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种要求告诉自己的政府，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来帮助这些贫民；我们可以捐钱给相关的国际组织来帮助战争的受害者；我们还可以作为志愿者直接参与对战争受害者的援助。因此，我们有能力、也应当对其他国家那些遭受痛苦的人提供帮助。

再次，政府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是国际伦理的主要行动者。

在许多情况下，只有政府才有能力解决国际伦理问题（如人道主义干预）。当然，在某些时候，政府又是国际伦理问题的制造者，例如，当一个国家的政府大规模地侵犯其公民的基本权利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想帮助其权利受到侵犯的人们，那么，我们就必须与该国的政府进行合作；当然，我们也可以要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对该国实施干预。无论以哪种方式，对这类国际伦理问题的解决，都不能诉诸作为自然人的个人，而只能诉诸政府或国际组织。因此，政府或国际组织是国际伦理的主要行动者。

最后，国际伦理与人际伦理也有很大的区别。当我们思考应当如何对待自己周围的人这一问题时，我们一般都会意识到他们所持有的价值观和道德信念，而我们也常常与他们共享这些价值观和道德信念。然而，当我们思考的是国际伦理问题时，我们却发现，我们面对的往往是那些与我们不同的文化和传统，生活在这些文化和传统中的人持有的价值观和道德信念与我们自己的常常会有很大的区别；有时，我们与他们持有的价值观和道德信念甚至是相互矛盾或相互冲突的。在与这些持有不同价值观和道德信念的人们交往时，我们往往难以决定，究竟是尊重他们的传统和习惯，还是要求他们接受那些具有普遍价值的伦理原则。一些学者从文化多元主义出发，反对推行具有全球意义的普遍价值；一些学者则认为，不能从文化多元主义中推导出伦理相对主义。在后者看来，作为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我们应当接受具有全球意义的普遍伦理原则。^[4]

当代国际伦理的内容非常丰富。石斌教授基于多年的研究，把当代的国际伦理问题归纳为四大类、十大项，为当代的国际伦理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鸟瞰图景。^[5]这四大类国际伦理问题是：

第一，全球性问题，例如大规模毁灭一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国际毒品走私等跨国犯罪问题，以及全球环境伦理问题，等等。这些伦理问题对全世界的人民都产生了

影响，只能依靠全世界的共同努力才能加以解决。

第二，与国家主权有关的伦理问题。例如，全球化与主权国家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人权保护与国际干预问题，移民与民族国家的利益问题，种族与民族冲突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以及国家在某些情况下是否应该向国际组织或区域性国家集团让渡部分主权等问题。

第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交换与分配正义问题。例如，自由贸易体制与跨国公司的活动所引发的伦理问题，富国对穷国的责任与义务问题，全球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的伦理论争等问题。

第四，国际治理或国际体制（regimes）问题。这类问题涉及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法制化和制度化的伦理问题，国际规范的确立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善问题。

在这四大类的基础上，石斌教授进一步归纳了当代最突出的十项国际伦理问题（见下表）。

当代最突出的十项国际伦理问题及其表现形式

主题	外部特征或表现形式	国际关系伦理内涵	主要思潮、观点与分歧
1. 国际干预	(1) (出于战略或政治目的) 军事干预、经济制裁等； (2) 人道主义干预。	(1) 干预他国内政是否正当； (2) 对有关国家或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实际影响，因滥用暴力造成得不偿失的非正义后果问题； (3) 对非战斗性目标（尤其平民）的伤害问题； (4) 一般战争伦理的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问题。	(1)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国宪章》的不干预主权原则、排斥一切干预的传统主权观念； (2) 伤亡代价不能大于目的之价值的“比例原则”； (3) 新干预主义； (4) 人权高于主权论。

(续表)

2.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	核武器、生化武器等大规模毁灭性杀伤性武器的生产、储存、扩散、使用或威胁使用问题。	(1) 核伦理, 核讹诈与核威慑的道义问题; (2) 战争伦理。	(1) 普格沃什运动、和平运动; (2) 国际军备控制协议框架; (3) 政治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念; (4) 超级大国的绝对安全观念。
3. 全球治理与国际体制	(1) 国际治理机构和法律体系的发展, 国际原则、规范、规则或决策程序的确立; (2) 全球化与区域化及其对主权内涵、安全观念及民族国家地位与作用的影响。	(1) 国际体制的程序正义与结果(分配)正义; (2) 国际法律标准是否应优先于民族国家个体的内部立法, 国际合作与主权让渡问题; (3) 国际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与制度霸权的矛盾, 国际机制所体现的强权利益与偏好。	(1) 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 (2) 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 (3) 现实主义的/国家理性的与全球主义的/类价值; (4) 发展中国家关注国际体制的公平与正义, 发达国家强调秩序与稳定。
4. 国际分配正义	(1) 全球化的非均衡发展: 南北资源、财富占有上的两极分化与经济贸易权利不平等; (2) 信息社会中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	(1) 自由贸易体制与跨国公司的活动引发的道德论争; (2) 富国对穷国的责任与义务; (3) 全球化对国际分配正义的影响, 少数富国消耗大部分资源和大部分产品的合理性问题。	(1) 新全球化力量与反全球化运动; (2) 救生艇伦理与太空船伦理; (3) 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主义三大理论范式间的分歧。

(续表)

5. 民族与民族主义	(1) 民族、种族或部族冲突； (2) 民族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原教旨主义； (3) 民族主义导致国家大量增生。	(1) 民族平等与民族发展问题； (2) 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冲突； (3) 民族国家增生与主权完整的矛盾。	(1) 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 (2) 积极的与消极的民族主义； (3) 文化多元主义、文化相对主义。
6. 人权的国际保护	(1) 联合国论坛上的人权交锋； (2) 双边或多边关系中的人权冲突； (3) 人权外交/人道主义干预。	(1) 对他国人权问题的道德立场； (2) 双重标准问题； (3) 人道主义干预的目的、手段与效果的正义性问题。	(1) 三个世界的人权观念(分别强调公民权、政治权利及财产权,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自决权与发展权)； (2) 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 (3) 人权的国际干预与反干预。
7. 跨国犯罪	国际毒品走私、武器走私、国际恐怖主义等有组织跨国犯罪活动。	(1) 各国合作打击跨国犯罪的责任与义务； (2) 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怖斗争的正义性问题； (3) 双重标准问题。	(1) 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多种定义； (2) 道德立场或伦理取向的差异； (3) 以暴易暴与反对滥施暴力。

(续表)

8. 妇女问题	(1) 对妇女的权益与地位的国际关注； (2) 妇女在国际政治的理论与实践中的边缘化。	(1) 妇女与战争、政治、外交的关系； (2) 母性思维与国际和平； (3) 女性视角与国家的权力、安全和利益。	(1) (“观点派”、激进派与后现代等的) 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同传统现实主义理论范式的基本分歧； (2) 四大国际伦理传统(现实主义、国际主义、理性主义、激进主义)之间的差异。
9. 跨国移民	(1) 移民与难民潮席卷全球； (2) 移民接受国的种族冲突和社会问题； (3) 发达国家对移民的限制措施。	(1) 移民潮是否危害了接受国的利益； (2) 移民的公正待遇问题； (3) 对国际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	(1) 新黄祸论； (2) 肯定移民劳工对接受国的贡献； (3) 联合国人道主义救援方针。
10. 人与自然的冲突	环境、生态、人口、资源危机及艾滋病等疾病扩散等各种全球性问题。	(1) 民族国家个体的生存与发展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之关系、民族国家个体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协调问题； (2) 富国是否应承担更多的环境治理责任。	(1) 环境伦理、全球伦理与国家道德、国家理性； (2) 救生艇伦理与太空船伦理。

(李军)

三

当代的国际伦理研究是建立在历史悠久的道德与政治思想的基础之上的；这些思想都试图探究与这一问题有关的众多伦理与哲学问题：人们应当如何以一种反思和负责任的方式生活在一起。这种探究都承认人的社会属性，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可避免地要与他人发生关系，因而我们的道德信念和政治决定将不可避免地要对他人的生活与决定产生重要影响。这些问题仍然是当代国际伦理的重要主题。

从历史的角度看，至少从公元前5世纪修昔底德的时代起，国际政治与道德问题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描绘的雅典人与斯巴达人之间的冲突，就是一个关于道德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与困境的醒目事例。该书在关于米洛斯岛人的对话中，探讨了究竟应当用“正义”还是“自利”来调节不同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这一国际伦理的关键问题。雅典人试图用所谓的现实主义原则来证明他们对米洛斯岛的征服，以及对米洛斯岛人的屠杀与奴役；他们宣称，“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能够接受的一切”。^[7]然而，雅典人的辩护并没有完全回避道德，而是根据某种自然的相对主义来定义道德。他们认为，“正义的标准是以同等的强迫力量为基础的”。^[7]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来说，在国际事务中，米洛斯人赞成的是形式正义，而雅典人坚持的则是比例正义：基于其相对的“强迫力量”，对不同的政治共同体可以给予合理的不平等对待。根据这些条款，强者统治弱者、弱者屈服于强者，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因此，修昔底德的著作提出了国际伦理研究的一个最为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是否应当依据那些适用于我们自己之共同体成员的伦理原则或伦理标准来对待“陌生人”？

去米洛斯岛的雅典代表团坚持的是一种狭隘的道德关怀态度。根据这种态度，当在作出关于应当帮助谁、应当伤害谁的决策时，偏爱自己的共同体不仅是允许的，甚至是义务所要求的。这种伦理偏袒与常识道德是一致的，因为，许多人都承认，我们对那些我们与之拥有个人关系或特殊纽带的人所负有的义务在规范的意义上是更重要的；人们一般都对“自己人”负有更多的道德关怀，对仅仅认识的人则负有较少的义务，而对陌生人则负有最少的义务。

当然，西方文化中也包含着超越和克服道德偏袒主义的传统。例如，古希腊罗马的斯多葛派哲学家所接受的世界主义就持有一种广泛的道德关怀视野，因为，它坚持认为，道德关怀的范围应当是普遍的，延伸到所有的人类成员。对斯多葛派来说，人类共同具有的理性思维能力为世界共同体中的同胞身份提供了基础，如果作为理性存在物，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那么，所有的人就构成了一个单一的共同体。我们既应当关心本地共同体中的公民，也应当关心世界的公民。

康德更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世界主义的国际伦理传统。康德的国际伦理概念建立在绝对命令的基础之上。绝对命令的各种版本都表达了这样一条普遍性原则：所有的人都拥有内在的价值或尊严。康德认为，这一原则对所有地方的所有人都是有效的，它为尊重他人之尊严这一普遍义务提供了一个基础。在康德看来，共和政体为正义提供了“正当的条件”。换言之，权利或道德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国家应当接受公共法律体系，该体系为个人权利的实现提供了必要条件。康德用三个重叠的公共法确立了正义的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城邦法或公民法、国际法或国家法、世界主义法。世界主义法致力于保护“好客”的权利，即对所有人的一种普遍权利。康德相信，只要我们基于人的尊严这一原则建立了一种伦理的国际秩序，我们就能实现这样一种状态：在其中，

世界上一个地方所发生的对人权的侵犯都将被其余所有地方的人感受到。

康德的观点对现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承认，人权和普遍人权概念是国际伦理的内在要素。康德对国际权利的阐述还触及战争的核心问题，即，是否存在某些可以用来证明或限制战争的相关的规范伦理原则。例如，康德关于由诸多共和国组成的邦联能够使永久和平成为可能的观点，不仅直接挑战了关于无政府和不安全是国际社会之持久特征的现实主义信念，它还使我们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国家的国际行为受到其国内政治结构之性质的重大影响。康德赞成共和宪政，因为它不仅能够保护个人的权利，还为维护那些性质相同的国家之间的和平提供了一个机制。康德指出：

“共和宪政……提供了实现理想目标（即永久和平）的前景，其理由如下：就像这种宪政所要求的那样，如果在这一条件的约束下，在决定是否宣布发动战争时，需要获得公民的同意，那么，他们在从事如此危险的一项事业时，一定会非常谨慎。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自己要承担战争所带来的所有悲剧。”^[8]

康德认为，随着具有共和政体的国家越来越多，国际冲突将会减少。由于把国家的敌对行为或和平行为与国家的特定政治制度、决策程序和文化（如对宽容、冲突化解与公开辩论的承诺）联系起来，康德为民主和平主题奠定了理论基础。民主和平主题包含两个命题：一个命题是，成熟或稳定的民主能够有望维持民主国家（但不一定是与非民主国家）之间的和平；另一命题是，在与其他国家（包括非民主国家）交往时，民主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倾向于采取和平的方式。康德的这些观点都对现代的国际伦理研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中也存在着明显的世界主义传统，为现代人思考国际伦理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的儒家具有浓厚

的世界主义情怀。孟子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观念（《孟子·梁惠王上》）。成书于西汉的《礼记·礼运》初步总结了中国人所理解的世界主义的基本轮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宋代的张载（1020—1077）则进一步深化了儒家的世界主义观念：“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凡天下疲癯残疾、茕独鰥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冀也。”（张载《正蒙·乾坤》）。因此，儒家认为，我们对每一个人都负有道德义务。墨子倡导“兼相爱”，主张“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墨子认为战争是不义之举，因此，他反对战争，主张“非攻”，“杀一人谓之不义……杀十人，十重不义……杀百人，百重不义”；而最不义的事，就是侵略其他国家（《墨子·非攻上》）。因此，墨家具有和平主义倾向，反对战争，主张平等的博爱，要求人们公平地对待自己的国家与他人的国家。到了20世纪初，虽然民族主义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中国也因民族主义意识不够强大而遭受着各种耻辱和苦难，但是，康有为仍高瞻远瞩地指出，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破除种族、国家之间的界限，建立世界主义的全球政治制度，才是消除民族国家之间的连年战争、实现人人幸福的大同理想的必由之路。^[9]

四

《中国应用伦理学 2011—2013：国际伦理专辑》由六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基础理论与重要理念”探讨的是国际伦理的一些基础理论问题，如国际伦理的基本含义，国际正义的基本要求、作为普遍价值的民主、普遍伦理与文化冲突等。第二部分“民族主义、世界主义与国际伦理”关注的是民族主义与

世界主义的价值诉求问题。第三部分“人道主义干预”关注的是当代最引人注目的国际伦理问题，即人道主义干预的伦理问题。第四部分“全球科技伦理”从全球伦理的角度探讨了全球健康伦理、全球生命伦理、全球发展伦理与全球环境伦理等问题。第五部分“全球经济伦理”关注的是全球经济正义、后危机时代的全球伦理建构、国际贸易诚信、分配正义等问题。第六部分“国际伦理：文化传统与思想资源”探讨了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国际伦理资源问题，试图为当代的国际伦理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或新的灵感。

《中国应用伦理学 2011—2013：国际伦理专辑》中的论文都是从 2012 年 10 月在广西南宁举办的“第 8 次全国应用伦理学研讨会”的会议论文集集中精选出来的。这些论文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我国伦理学界国际伦理研究的最新成果和研究动向。

“第 8 次全国应用伦理学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广西民族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共同主办。广西民族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广西伦理学会为大会的顺利举行提供了重要的物质、经济和组织保障。金城出版社的王吉胜社长为《中国应用伦理学 2011—2013：国际伦理专辑》的出版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和帮助；金城出版社的柴桦编辑高效率地编辑了本书，使得本书能够快速出版。在此一并向上述机构和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者

参考文献

- [1] Mark R. Amstutz, *International Ethics: Concepts, Theories, and Cases in Global Politics*,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9, p.xi.